

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Poetry
in Mainland China before 1937

中国英诗汉译 史论

1937年以前部分

张 旭◎著

Drawing upon the theories of modern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book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poetry in mainland China before 1937. It is a specific history of poetry translation and a piece of scholarship as well. Aside from the introduction, the whole book consists of two main parts in accordance with two chronological periods, namely, the budding period before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developing period from 1919 to 1937. The introductory part succinctly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nature, conten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is current research. It absorbs th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current studi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brings forth the author's own viewpoints. The other two parts respectively illustrate the status quo, characteristics, major poets involved, readership, target language, and significant events of translation in the two periods; they also evaluate some important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translated poems in the two periods and meanwhile exam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ur national poetry development how English poetry, a factor of an alien culture, has been spread and accepted in China through the media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how it has been exerting impact and influence on Chinese poetry writing.

-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优秀成果
-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成果
- 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支持计划成果
- 国家重点学科湖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科支持计划成果

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Poetry
in Mainland China before 1937

中国英诗汉译 史论

1937年以前部分

张 旭◎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英诗汉译史论 / 张旭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438-7846-4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英语诗歌—文学翻译—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H315.9②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84392号

中国英诗汉译史论

张 旭 著

责任编辑: 莫 艳 吴韞丽

装帧设计: 谌 茜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

印 次: 201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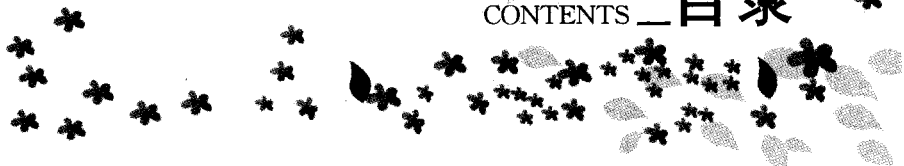
印 张: 26.75

字 数: 420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7846-4

定 价: 55.0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绪论

第一节	百年中国英诗汉译活动概貌	/001
第二节	英诗汉译与中国新诗的发展	/003
第三节	英诗汉译史的研究背景与展望	/006
第四节	英诗汉译史的研究目的与范围	/010
第五节	英诗翻译史的研究方法与意义	/011

1

第1章 中国近代英诗汉译若干史料钩沉

第一节	文化外求时期英诗汉译的预演篇	/015
第二节	文化碰撞时期英诗汉译的序幕篇	/026
第三节	文化动荡时期英诗汉译的新篇章	/029

2

第2章 近代在华传教士与英语宗教诗歌汉译

第一节	在华传教士的圣诗汉译活动说略	/039
第二节	在华传教士圣诗汉译中的诗艺追求	/051
第三节	在华传教士圣诗汉译中的翻译决策	/066

第8章 创造社三家英诗汉译散体化现象考察

- 第一节 成仿吾：“译诗也应当是诗” /268
- 第二节 郁达夫：“非我所爱读的东西不译” /278
- 第三节 郭沫若：“译出来的要是诗才行” /292

第9章 早期新月派成员英诗汉译新格律体实验考察

- 第一节 闻一多于译诗格律上的新探索 /308
- 第二节 徐志摩于新格律体译诗的实践 /327
- 第三节 朱湘于译诗新格律的追求 /349

第10章 白话文学语境中“学衡派”英诗汉译活动考察

- 第一节 “学衡派”成员译诗活动概观 /370
- 第二节 吴宓文言译诗中的艺术抉择 /377
- 第三节 吴芳吉于译诗音乐效果的营构 /389
- 第四节 “学衡派”众家复译中的诗艺追求 /403

○●○ 结语 /412

○●○ 后记 /416

翻译的一些传统呈现于本期的翻译活动过程中。当时众译家多是沿用主体文化中的诗学规范，也就是套用汉语中的文言格律体来盛纳那些形式相对自由的西洋诗歌，他们普遍苦于英汉两种文学体系尤其是英汉两种文学体系的语言和诗学品质间的巨大差异，其译作在接受上多受到限制，这也促成晚期的一些译家尝试用白话体进行翻译，进而导致诗的语言的一场变革。本阶段成绩较大的译诗家有苏曼殊、辜鸿铭、马君武、胡适、陆志韦、刘半农等，这些人均以各自的格律体译诗成就名载史册，尤其是刘半农、胡适等人对目标语的尝试，直接导致了诗歌领域的一场革命。

第二阶段则由零散的译介逐渐走向规模化。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全面展开，众多文学团体纷纷投入到外国诗歌翻译活动中，一些新文学杂志也用大量的篇幅专门刊登译诗作品，其中自然包括大量的汉译英语诗歌。为了配合当时的白话新诗改革运动，众译家已广泛地采用白话形式进行翻译，并逐渐集中到几位著名诗人作品的翻译上，所涉诗人主要有英国浪漫派几乎所有的重要诗人，以及美国的惠特曼、朗费罗等现代诗人。后期也开始了一些外国现代派与美国黑人诗作的零星译介。同时也出现了一批英诗翻译的大家，因服务于不同的艺术宗旨和意识形态追求，他们的译诗又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这些译家中，既有风格较为自由的郑振铎、郭沫若、成仿吾等，也有属于新格律派成员的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还有刻意选用文言体进行翻译的“学衡派”成员吴宓、吴芳吉、张荫麟等。这时从事翻译的人员多为诗人兼翻译家，他们在各自的诗歌创作中又不自觉地受到所译诗人的影响，由此推动了中国现代新诗运动的发展，并出现了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第三阶段与整个抗战同步。这一时期中国的英诗翻译活动并未因战争的爆发而中断，无论是敌占区还是大后方，都有许多人在默默地从事翻译活动，并形成了几块相对集中的诗歌翻译中心。从所发表的那些翻译作品来看，这时已很难见到早年那种文言体译诗，除非译者在翻译时出于某种特殊的考虑，众译家似乎就诗歌语言的白话化达成了共识。这个时期译介到的主要诗人除英国的拜伦、雪莱、莎士比亚等外，还有美国的惠特曼、朗士敦·休斯、奥登以及其他一些现代诗人。主要译家有高寒（楚图南）、袁水拍、傅东华、王统照、梁宗岱、赵萝蕤、戴镛龄等。这些译家在各自的翻译过程中均刻意从中西诗学特质的角度着眼，特别注重英语诗歌形式

的发展与异域诗歌的渗透大致同步。

如果说 20 世纪初叶中国的诗歌从旧体诗中分化出来是从诗歌语言变革开始的,那么新世纪里的诗歌翻译,区别于以往的翻译就在于目标语的全面白话化。近代学人梁启超等人标举“三界革命”的旗号,其中就包含了“诗界革命”在内,而且这些倡导者本身力主从外域文化中输入有益的文学因子,其间自然包含了翻译诗歌。白话文学运动的发起人胡适当年提出“作诗如作文”以及“文学八事”的主张,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他通过外国诗歌翻译接触到的英美意象派等文艺思潮。后来陈独秀等主持的《新青年》杂志留有很大的篇幅刊登翻译文学作品,而这份作为当时白话文艺运动核心阵地的刊物,登载的译诗自然都是白话体形式。可以说,自从《新青年》杂志率先刊登一些白话译诗,由此全面拉开了中国现代诗歌翻译与新诗创作的序幕。到了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新兴的文学团体纷纷建立,它们普遍重视外国诗歌的翻译问题,这些团体彼此之间文学主张和艺术追求互不相同,决定了众人在各自的翻译中表现出异样的价值取向。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文学研究会注重翻译弱小民族的诗歌,其核心刊物如《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文学旬刊》等不断地刊登拜伦、弥尔顿等诗人反映抗争性题材的作品,还有通过英文转译的其他弱小民族国家的诗作,同时包括泰戈尔这种来自东方殖民地诗人用英文发表的作品,这样就形成了文学研究会多数成员的现实主义诗风。创造社标举“创造精神”,决定了他们对雪莱、惠特曼等为代表的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钟爱,其成员如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无不以其特有的自由奔放的浪漫主义诗风打动过千万读者的心灵,这一创作风格也代表了未来中国新诗的一大走势。而那群标举“理性节制情感”的新月派成员,多以其与生俱来的贵族般的气质而对虚无、悲观的浪漫派诗风倍感亲切,他们的翻译诗歌大多诗境优美、技巧圆熟,却不乏表现空虚和痛苦的内容,由此成就了他们自身的新格律体诗歌创作,进而诞生了中国新诗中另一大流派——新格律体诗派。到了三四十年代,战争的原因促使众多翻译家对那些带有战斗性主题的诗篇产生浓厚的兴趣,加之当时特殊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体系的规约作用,导致了中国战时这一接受环境中数量众多的反映抗战主题的现实主义诗作和对现实持强烈批判或怀疑态势的现代派诗歌的兴起。此间,一部分人特别钟情于莎士比亚等人的十四行体抒情诗,并刻意于翻译和模仿,由此造

就出几位足以立于世界诗歌之林的十四行体诗人。抗战胜利后，人们开始对现实抱乐观态度，这又使他们对惠特曼等人的诗作倍加钟爱，并出现了较多的译介，于是一些从译诗中获得的清新的现代派创作理念也融入中国诗歌创作中。可以说，时至20世纪的前50年，英、美国家的主要诗人与诗作，虽说不是全部，有许多都被中国译家译介过，他们虽然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代表着不同的流派，有着相异的渊源，却在20世纪的前50年内相继涌入中国的译坛，继而冲击并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界，促成中国诗歌领域新格局的出现。同时这种不同与互异在时间上的衔接演变，也正是翻译诗歌史的任务。如果能从民族文学发展的视角来体察英语诗歌汉译的问题，审视翻译诗歌和中国新诗发展的关系，必然会有一番新的发现。

诚如现代西方学者所言：要对文学做深入的认识，必然离不开语言，同样，对语言的洞察更是离不开文学^①。这点对于汉语界翻译诗歌的研究同样适用。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英语诗歌汉译中的目标语嬗变情况和诗歌形式译方式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新诗在翻译诗歌的冲击和影响下的发展脉络。当年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1935）中曾明确指出：“五四”以后的新诗革命与近代“诗界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新诗从诗体解放入手”^②。这里所谓的“诗体解放”，就是要追求诗歌形式方面的解放。综合地考察近、现代中国的英诗汉译状况，发现胡适、刘半农、成仿吾、郭沫若以及后来的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人，早年无不从事古典诗词的写作，只是后来他们陆续接触到外国诗歌，并通过各自亲身的体验和翻译，不断地丰富了各自作新诗的经验。中国新诗的发展轨迹亦表明，在经过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早期白话诗人步履蹒跚的短暂尝试后，郭沫若、徐志摩等人十分注重从外国诗歌中汲取有益的形式因子，于是一举结束了早期新诗在形式上文白参半的稚拙状态，使新诗真正获得了自由的生命。当年朱自清将新诗权威性地区分为几大派别：自由诗派、格律诗派以及象征诗派^③，这种做法又一定程度地规约了未来中国新诗发展的走势。延续前一时期创作自由体新诗的传统，特别是到了三四十年代，那些后来被文学史归入现代派诗人之列的众多中国诗人，如

① Geoffrey N. Leech,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td., 1969, p. 1.

②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2页。

③ 同上，第8页。

卞之琳、穆旦（查良铮）等，更是敢为天下先，直接从翻译诗歌中借鉴和移入更多的形式因子，这些外来的因子，有观念上的，有语言上的，有格律上的，也有其他现代表现方式上的。可以说，正是这种诗歌翻译经验的滋润和培育，成就了“中国新诗”创作中又一堪称典范的现代派诗风。而过去的翻译诗歌中语言形式上的变化、发展、成熟（或称定型）的过程，直接表征着中国新诗的变化与发展。这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不可辩驳的事实。

第三节◎英诗汉译史的研究背景与展望

将翻译文学作为一项相关的因素加以考察，在中国现代早期的几部文学史中就有所体现。如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和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都设有“翻译文学”一章，并部分地涉及诗歌翻译的内容^①。不过在其后几乎所有的文学史中，大多干脆采取类似于现象学研究中常用的“悬搁”（suspending）或加括号（bracketing）的方法，对诗歌翻译问题暂且避而不论。这种有意或无意的“疏忽”多少有点遗憾。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在中国翻译史或翻译文学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撰写了一批分量厚重的著作，如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1984）、《中国翻译史》（上卷，1999）和《中国翻译通史》（2006），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9），臧克伦的《中国翻译史话》（1991），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罗选民、田德蓓、张旭的《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2004），谢天振、查明建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2004），孟昭毅的《中国翻译文学史》（2005），李伟的《中国近代翻译史》（2005），方华文的《20世纪中国翻译史》（2005），王向远的《东方文学译介与研究》（2007），查明建、谢天振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下，2007），杨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2009）等。这些著作均涉及一些近、现代翻译诗歌问题，但缺乏对汉译英诗的专门论述，甚少或根本未曾论及

^① 参见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第132～163页；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海：上海书店，1933年，第259～279页。

翻译诗歌,尤其是英语诗歌与中国民族诗歌的关系问题。

从中外文学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近年来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建树性的著作,如王佐良的《中外文学之间》(1984),王锦厚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1989),范伯群、朱栋霖的《1898—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1993),周发祥等的《中外文学交流史》(1999),李标晶、黄爱华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2000),徐志啸的《近代中外文学关系》(2000)等,都有专章论述翻译诗歌对中国现代诗歌创作的影响,但未有汉译英诗对中国新诗影响的专门论著。

在西方,现代译学奠基人霍尔姆斯当年曾留意过翻译史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在他描绘的译学研究谱系中却未曾列有这一分支^①。近年则有不少学者在翻译史研究方面做出了一些新的探索,并取得了不少成就,其中成就较显著者有彻斯特曼(Chesterman, 1989)、利弗威尔(Lefevere, 1992)、华兹华斯(Wordsworth, 1996; 1998)、罗宾逊(Robinson, 1997)、皮姆(Pym, 1998; 2000)等。这当中又以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探索方面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其著作《翻译史方法》(*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1998)更是成了该领域中一部不可或缺的理论著作。另外,威廉姆斯与彻斯特曼在《线路图》(*The Map: 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2002)中明确地提出翻译史中的问题应包括译者、译作、原因和策略等问题;而华兹华斯近年也就翻译史的研究与教学有过专门的论述,特别是他在莫娜·贝克主编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1998)中撰写了“翻译史”的条目,就翻译史的定义、模式、方法等问题进行了介绍。所有的这些研究方法均行之有效,对于任何历史时期的翻译研究尤具启迪意义,同时对于汉译英诗也有借鉴价值。

与此同时,作为一门时兴的学科,描写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or DTS)近年来也日益受到足够的重视。首先,它那套建立在经验科学基础上完善的描写方法,备受人们的关注;其次,它还提出将

① 早在1972年宣读的“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的最后部分,霍尔姆斯就提到翻译史研究的问题,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当时开展得还较为薄弱。然而在他所设计的翻译研究理论框架中,只列有受时间限制(time-restricted)的研究,只是在文章最后才提到了翻译理论史和翻译描写史与应用翻译研究史问题,并说它们是相当新兴的研究领域。参见James S. Holmes,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Rodopi, 1988, pp. 67-80.

过去中国的英诗汉译发展轨迹进行系统描述,从影响和接受的角度阐释近百年来英诗汉译的演进过程,将具有特殊的意义。

现代哲人尼采(Frederich Nietzsche, 1844—1900)在19世纪末曾喊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he re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口号,这点在上世纪初曾被胡适借用过来,进而提出他的“评判的态度”,其实质就是对一切现存价值的重新估定和重新认识,并以一种新的态度来对旧的中国文明做总体评判^①。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当今汉语学界又打出了重构文学史、拓展翻译研究视野的新旗号。同时,诞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十分重视文学文本在历史中的地位^②,众学人普遍关心历史语境对于解释文学文本的作用,以及文学修辞在解释历史过程中的作用^③。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历史是由人书写的。在书写的过程中,写作者必然受到种种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一定的价值取向,这样的写作难免会刻意于历史事件某些方面的凸显,甚至有歪曲历史的现象发生,这种历史也因此会带有种种局限性。这就决定着历史需要不断地重写和重构。而重构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创新,它是一项极为严肃的又相当诱人的任务,同时也是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结合文学批评与翻译研究问题,过去十余年来,本人先后参加了一系列的科研项目,尤其是罗选民教授主持的“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的课题研究。本人通过对汉译英语诗歌的系统考察,曾撰写过一系列的论文,如《美国早期诗歌翻译在中国》(1997)、《美国现代诗歌翻译在中国》(1997)、《穆旦的译诗与创作》(2002)、《译经文学传统与近代英诗汉译》(2002)、《胡适与英诗翻译》(2003)、《现代英诗汉译中新格律体实验考察》(2004)、《刘半农早期英诗汉译活动考察》(2009)等,考察了近百年来英语诗歌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以及这些翻译诗歌如何影响中国的诗歌创作,这样积累了一些研究经验和体会。总之,全面系统地探讨英诗汉译状况在中国至今仍是一项薄弱环节,且这一研究又有着广阔的前景,故而很有必要把该研究继续开展下去,为完成构拟诗歌翻译史的使命尽一份力量。

① 参见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7卷1期(1919年12月1日)。

② H. Aram Veese (ed.), “The New Historicism”, *The New Historicism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 2, 16-17.

③ John Brannigan,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8, p. 4.

则等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在具体的论述上，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联系中国近现代诗歌的创作经验，以近百年来英语诗歌翻译的历史描写为经，以典型个案研究为纬，系统地描述英诗翻译的特征，以及时代文学观与中国新诗创作的关系。

在论述的过程中，还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借鉴阐释学的有关原理，通过对译者与译本、译本与译本、原作语言与目标语言、异域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比较和阐释，揭示异质，彰显特征，描绘出不同时期的英诗翻译特征；同时还借鉴比较文学领域中影响研究和接受美学中接受研究的方法，运用资料统计方法调查不同时期的译诗流传和接受的情况，从而弄清英语诗歌是如何通过翻译的途径进入主体文学体系，进而影响中国的诗歌创作的。

本书既为学术专著，亦为翻译诗歌断代批评史。从断代史说，本书聚焦于历史发展上的某一特定时间段，同时认真汲取现存史料和现有论述的某些研究成果。从专著说，本书跟前人对相同时期翻译文学史表述不同，在体例安排、内容取舍、观点评价等方面颇不相同。它注重对翻译诗歌史的重点部分提出自己的研究心得，探讨各个不同时期的翻译诗歌对主体民族文学发展的主要贡献，进而研究翻译文学史上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本书遵循的原则，正如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言：“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翻译诗歌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时至今日，甚少有人对中国的翻译诗歌做全面、系统的考察，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一部《诗歌翻译史》，更谈不上有一部《英语诗歌汉译史》。笔者虽撰写过一系列的论文，考察了近百年来英美诗歌在中国译介的大致情况，也积累了一些研究经验和体会，但远远谈不上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故而希望通过专题性研究，考察近百年来英诗汉译的嬗变状况，撰写一部《中国英诗汉译史论》，以填补空白。因限于篇幅，本书仅考察 1937 年抗战爆发以前部分；至于以后部分，将另有专书予以讨论。

同时，著者希望在研究方法上有一些新的尝试，运用相关学科的一些理论，如版本学、统计学、社会学、文艺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等领域的一些方法，来解释种种翻译现象和翻译活动，并结合翻译文学和民族文学，

第 1 章

中国近代英诗汉译若干史料钩沉



从历时的维度来审视中国翻译的发展状况，发现历史上每次翻译高潮的到来，均会给中国输入诸多异域文化因子。始于东汉并延续至隋唐的第一次翻译高潮，顺理成章地给中国传入了印度哲学和佛教，尽管后来的事实表明它们对中国社会并未产生多大积极的影响；始于明末清初的第二次翻译高潮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科技文明，由此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局部变革，带动了中国产业经济的发展，并导致近代社会结构局部变化；历处晚清至民国初期这数十年间兴起的第三次翻译高潮，不但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和人民的思想状态起到了积极的冲击和提高作用，随之也输入了包括诗歌在内的现代西方各种文类形式（genres）。在这场东西两种异质文化体系发生激烈碰撞和交汇的过程中，人们或是通过留学生和有识之士的积极宣传以及报章、杂志对西洋各国的及时报道，或是通过外国书籍译本的传布，初步了解西方。这其中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具有相当大的功绩。

从共时的层面来考察世界各国的翻译活动，却是另一番景观。受各民族语言文学内在规范（literary norms）的制约，在国际间的文学互译中，诗歌这种特殊文类形式的翻译数量必然会最少^①。除去早年由西洋传教士为着求“善”的目的，在传布宗教的过程中顺带译出那些属于“美”的王国的宗教诗篇，中国近代的外国诗歌汉译是不经意间从弥尔顿的一首题为

① 参见 Christina Schäffner (ed.), *Translation and Norm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9. 书中有许多篇幅专门讨论文学规范与翻译问题；另外在 James Holmes 著,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Ed. Van den Broeck, Amsterdam: Rodopi, 1988) 一书中也有就诗歌翻译问题的专门论述。

至于非宗教类英语诗歌最初被译成汉语，则始于清末咸丰年间（1854）^①。迄今发现最早的英诗汉译作品，是1854年9月发表于香港的《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月刊的一首诗作^②，即西方某传教士译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的《论失明》（*On His Blindness*）。全诗如下：

世茫茫兮，我目已盲，
静言思之，尚未半生。
天赋两目，如耗千金，
今我藏之，其责难任。
嗟我目兮，于我无用，
虽则无用，我心郑重。
忠以计会，虔以事主，
恐主归时，纵刑无补。
嗟彼上帝，既闭我瞳，
愚心自忖，其责我工。
忍耐之心，可生奥义，
苍苍上帝，不较所赐。
不较所赐，岂较作事，
惟与我辄，负之靡暨。
上帝惟皇，在彼苍苍，
一呼其令，万臣锵锵。
驶行水陆，莫敢遑适，

① 施蛰存认为早年根据英译本翻译出版的《旧约全书》中的《雅歌》部分应该是最早的译诗，此话不假，但原创性英语诗歌的翻译还是自清代末年始。参见施蛰存：《序言》，《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卷1），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10页。

② 《遐迩贯珍》创刊于1853年8月1日，是自《南京条约》签订后，最早出现的中文刊物，并且是中国的第一份宗教类期刊。由当时设在香港的马礼逊教育会出资，伦敦会上海传教站负责人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为第一任主编，并由英华书院印刷，为竹纸单面铅印、线装。《遐迩贯珍》属教会报，但篇幅最多的是时事政治新闻和评论、商情、科学文化。内容包括言论、新闻、传道、寓言及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文章，涉及军事、外交、时人行踪、市政建设等中国新闻，还有刊登商品行情及船期的广告，开创中文报刊刊登广告之先河。《遐迩贯珍》在当时拥有大量中国读者，开始了香港近代中文报刊业的时代。它于1856年5月停刊。

言，终难割爱。董酝卿尚书属总署司员就其本裁以七绝，以长友诗作分注句下，仿注范书式也。录之见海外好文，或可备他日史乘之采……①

后面省略的便是二人的译文。董译每句后都附有威妥玛的译诗，并用括号标出。据钱钟书考证：这里所说的“使臣威妥玛”，即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他与中国人董酝卿（董恂）合作翻译的“欧罗巴人长友诗”，系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的《人生颂》（*A Psalm of Life*, 1838）。该诗曾一度被视为英语诗歌中最早被译成汉语的一首②。而从该作实际译出和发表的时间来看，晚于西人译《论失明》十年。应该注意的是，当时清朝官吏翻译外国诗，只是为了“同文远被西洋贾”③，这是站在汉文化本位立场的中国士大夫，在主张汉文化优越性的同时，偶尔持天下一家的世界主义姿态，而表征出吸引外国商贾学习汉语，进而接受中国文化，这与我们今天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用意恰好相反。

《人生颂》一诗最先在清同治三年（1864）由威妥玛译出初稿，次年3月经董恂（1807—1892）改为七绝，原诗作者“Longfellow”（朗费罗）的名字被意译为“长人”或“长友”。译诗后被抄录在一面中国式折扇上，由当时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离任回国时带给原诗作者朗费罗，朗氏自然将它作为珍品陈列在自己的书桌上④。现录二人的译诗如下：

威妥玛译文

勿以忧时言/人生若虚梦/性灵睡即与死无异/不仅形骸尚有灵在//

① 《清朝野史大观》（下，卷十），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第90页；该段文字最先见于清朝方浚师撰、盛冬铃点校：《蕉轩随录·卷十二·长友诗》（1872），方氏退一步斋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76~477页。另外1926年1月29日玉麟撰的《同治时长友诗之翻译》（载《语丝》第116期）有较详细的介绍。

② 钱钟书：《汉译第一首英诗〈人生颂〉》，载《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7页。

③ 方浚师撰、盛冬铃点校：《蕉轩随录》（卷十二），第478页。

④ 此扇现存美国朗费罗国家纪念馆（Longfellow National Historic Site），扇面落款为“同治乙丑仲春之月，杨州董恂”。由此可见董恂改译《人生颂》的年份是1865年2月。据《朗费罗传》1865年11月30日《日记》记载：“邀蒲安臣夫妇返，得中国扇，志喜也。扇为中华一达官所赠，上以华文《人生颂》。”参见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汉口：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1页。另见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63页。

人生世上行走非虚生也总期有用/何谓死埋方至极处/圣书所云人身原土终当归土/此言人身非谓灵也//其乐其忧均不可专务/天之生人别有所命/所命者作为专图日日长进/明日尤要更有进步//作事需时惜时飞去/人心纵有壮胆远志/仍如丧鼓之敲/皆系向墓道去//人世如大战场/如众军在林下野盘/莫如牛羊无言待人驱策/争宜努力作英雄//勿言异日有可乐之时/既往日亦由己埋己/目下努力切切/中尽己心上赖天佑//著名人传看则系念/想我们在世亦可置身高处/去世时尚有痕迹/势如留在海边沙面//盖人世如同大海/果有他人过海/船只搁浅受难失望/见海边有迹才可销/顾此即应奋起动身/心中预定无论如何总期有济歎/日有成功愈求进功/习其用工坚忍不可中止^①

董恂译文

莫将烦恼著诗篇/百岁原如一觉眠/梦短梦长同是梦/独留真气满乾坤//天地生材总不虚/由来豹死尚留皮/纵然出土仍归土/灵性常存无绝期//无端忧乐日相循/天命斯人自有真/人法天行强不息/一时功业一时新//无术挥戈学鲁阳/枉谈肝胆异寻常/一从薤露歌声起/邱陇无人宿草荒//扰扰红尘听鼓鼙/风吹大漠草萋萋/驾骀甘待鞭笞下/骐骥谁能轡勒羈//休道将来乐有时/可怜往事不堪思/只今有力均须努/人力殚时天佑之//千秋万代远蜚声/学步金鳌顶上行/已去冥鸿亦有迹/雪泥爪印认分明//茫茫尘世海中沤/才过来舟又去舟/欲问失帆谁挽救/沙洲遗迹可追求//一鞭从此跃征鞍/不到峰头心不甘/日进日高还日上/肯教中道偶停驂^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988)有载:翻译官出身的威妥玛在华期间曾编写过一部汉语课本《语言自述集》(*A Progressive Course: Colloquial Chinese*, 1867),设计用自己首创、用拉丁文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法,后经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修订,为世人所沿用,俗称“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法”(Wade-Giles Spelling System)。这也是清末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前,中国和国际上最流行的一套拼音

①② 方浚师撰、盛冬铃点校:《蕉轩随录》(卷十二),第477~478页。

方案^①。回英国后，威托玛还担任过剑桥大学首席汉语教授，可算是一位对汉语“颇有研究的专家”，故而在中英文化交流史上他敢于担当这一揭幕人的“重任”，将 *A Psalm of Life* 译成汉语诗。应当承认，威妥玛的确略知一些汉语古体诗法，仅他所译的前两句选用了五言古体，此后的各句却无法继续用整齐的五言逐译下去。于是他的译诗出现了史家所说的“句法或多或少，大抵古人长短句之意”的形式。仔细比较两首译诗，不难发现：威妥玛采取的翻译策略只是一种紧扣原文逐字逐行生硬对译（interlinear translation），钱钟书认为董译“倒暗合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0）的主张，译者根据、依仿原作而作出自己的诗”^②。威译诗味索然，读之使人生厌；进士出身的清廷户部尚书董恂的译诗，则诗意盎然，令汉语主体文化圈内的接受者读之而欣喜。威氏虽精于英文却拙于汉语，董氏精通汉语诗法与文化典故，可惜不懂英语原文。由于董译根据的只是不太高明的威译，与其说是译诗，不如说是再创作。这样的译诗，除个别地方外，即使用汉语诗学的标准来评判，仍不失为一首上佳的古汉语格律诗：每节都是一首漂亮的七言绝句（第五句除外），韵式整齐划一；诗味亦浓，几乎每节乃至每句都合乎古汉语诗法或带有浓厚的华夏文化典故的痕迹，容易使谙熟主体文化的读者联想起某些广为传颂的古代佳句。

再则，原诗是有韵脚的，却被威氏处理成“有章无韵”的形式，似乎还较董氏改译的七言绝句能保存一些“信”；改译者在具体的操作中，因受七绝的平仄规范以及字数的限制，又选用汉语文化典故，从而出现种种误译。细细思虑，这是那个时代的人难免的毛病。另外，该诗的翻译仍包含诸多偶然性成分，其译文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翻译。因为严格的英诗汉译，应该是指中国人有意识地在国内或国外用汉语翻译的那些英语诗歌作品。更确切地说，在中国近代翻译诗歌史上，像《人生颂》以及前面提到的《论失明》等诗的这种不经意的翻译只是一个引子，它不过是后来大规模介绍英语诗歌乃至整个西方诗歌活动前的一次预演，真正意义上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397～398页。

② 转引钱钟书：《汉译第一首英诗〈人生颂〉》，载《七缀集》，第125页。原文见海姆（R. Haym）：《赫尔德》（1958年东柏林重印本，第2册），第201页。另外叔本华在《哲学小品》（*Parerga und Paralipomena*）第25章299节也认为这是译诗的唯一办法。